

## 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 意欲彻底推翻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 它试图从整体主义历史观的视野来展开论证过程。但其结果却制造了另一种中心论“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 而在这种新的中心论的叙述中, 仍然可以发现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它的欧洲中心观批判, 虽然值得同情, 但是并没有抓住要害。

**关键词:** 弗兰克 欧洲中心论 整体史观 中国(东方)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 K504

**文献标识码:** A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 意欲彻底推翻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 因此特意找到了它的对立面, 申言在18世纪之前, 世界一直是“东方中心”甚至是“中国中心”。他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之上, 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 无疑选择了一个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但通观全书, 他对“整体史观”的信仰往往有口无心, 言不由衷。

据我所知, “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 不是“社会史”), 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 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 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 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 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 “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 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 即“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 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首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 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的, 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 个性各各不同, 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 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的分析框架, 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1927年, 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 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 “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 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 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 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 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 骨子里就贯穿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

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 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考察视野: “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 整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论)等人的“世界体系”, 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 而与“欧洲中心论”

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史”。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彩，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对“中国中心论”的提法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阅读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的身影时隐时现：“（1990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1994年与吉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11、17页）；“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19页）；“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168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169页）；“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第2章12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180页）。在该节中弗氏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185页）。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缘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缘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第435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缘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1800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19—20世纪只是雄狮打了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始终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目的论了吗？这同他所批判的“欧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也不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80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马——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谈，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11、17、26、168、266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55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为着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

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26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决定着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他“社会”的能力，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自己的周边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曾不断与中原王朝爆发军事冲突。尽管内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但除非他们移居内地、长期融合，即使近在咫尺（相对与西方的距离），他们的“社会”仍会一如其故，弗兰克所谓“中心”塑造另一“社会”的法道也大失水准。最典型的是元王朝灭亡后，重返大漠的蒙古族又回复到原先游牧部族分散的状态。在此之前的“金”遗民北返白山黑水，情况亦然如此。直到1949年前，南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还始终生活在“母系制”时代。进而说，弗兰克所极力推崇的明清江南经济，是谓“同心圆”核心的核心，其辐射能力也远没有遍及中国所有内地，在第一小圈内就不灵。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至今仍为每个中国人所深切体验。近距离的“塑造”不成功，而远距离却成功地“塑造”出了“西方的兴起”，对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悖论，离开了各社会的“内因”分析，不知弗兰克“世界体系”的整体论（即所谓“共同”参与、“共同”塑造）将如何通释？

“五千年”一贯制的“世界体系”还迫使弗兰克走向更危险的偏峰，用“世界体系”的横向联系遮蔽甚至顶替了时间向度方面的纵向考察。在他解读的“世界史”里，只有“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往复循环，而没有历史学基本的历史分期概念。他不仅主张“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也不承认有什么“现代性”，而且明确宣布世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第441、439页）。历史成了圆形的“金色池塘”，而不是

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

实际弗兰克并非属于感觉迟钝的一类人，也决不缺少机智。他拒绝任何标识社会“进步”的历史分期方法，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史学界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聚讼不决的短处。已有的各种分期方案确实无不受到驳诘，评价标准也存在“文明与文化之争”深刻的价值对峙。因此弗兰克不难找到各方提供的“子弹”，进而否定各方。周而复始的“圆”是一种混沌，混沌能说明历史吗？大时段的历史演进虽一时难以名之，“进步”也非“直线”，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时代进步毕竟是遮掩不住的经验事实。假若说“农业时代”变化节奏缓慢的特性使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东西方孰优也可以各执一词，至少从19世纪起，以西方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物质生产、科技发明、制度演进等领域创新变革幅度之大，是前此数千年来所无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全新的变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距完全被拉开了。我相信弗兰克一定读过《第三次浪潮》，然而他就是不提托夫勒粗线条的，最适宜用以宏观关照的“大历史”分期方法。他可以跳开“第二次浪潮”这样的概念，但他怎么也不能跳开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西方兴起”一关。

“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险关，阻住了弗兰克一路狂奔的步伐。他神气顿失，话语也变得结结巴巴，如“尽管我们对这些（指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第393、383页）等等。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不是无关大局，可以随便含混过去的。

弗兰克对“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大历史关节时序的交代，表述是含混而不确定的。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即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即使某一历史事件被历史学家选定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历史分期的方法论需要，也最易引起争讼），但升降盛衰一定在此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说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才能成为此前与此后经验事实可以不断证实并证伪的“中时段”界标。弗兰克不是不知道这一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然而出于维护自身“体系”的潜意识，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欧洲先前已具备许多优越于亚洲的“发展优势”，更不能承认亚洲先于西方衰落，且先前亦有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内在结构性败因，仍然坚持“直到1800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亚洲仍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极端固执的结果，势必引出一个令人不解的神秘逻辑：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只能在1801年（在中国是1840年）的某一时刻同步发生。这就像他讽刺别人的，自己不也面对着“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诘问？

说弗兰克没有试图为“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提供自己的一套解释，显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此时立论的踌躇和缺乏某种自信溢于言表。弗兰克何以会一反常态，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呢？

造成这种解释困窘，首先应该归咎于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贯彻到底。他在讨论史学理论的最后一章里作过交代，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三维”）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第452页）。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

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

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

对“制度”的看法,他说道:“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首要的动力机制’——推动的,制度是通过‘次要的机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推动这些力量。”(第283页)为了与“欧洲中心论”对着干,他甚至宣称“1800年以前,亚洲许多地方的制度比欧洲更有效率”,“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亚洲和中国)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等等(第285、300、282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是:他赞成“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数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因而断言:“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或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神话’。”(第264页)然而为了贬低欧洲,他却借着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发挥道:“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似乎又在强调亚洲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应用价值”(第267页)。

尽管议论有点颠三倒四,如果弗兰克的批判真是针对着制度、科技片面决定论,也还不无合理性。但是熟悉当代学术的都可以感觉到,上述对诺斯、库恩,也包括韦伯的指责非常武断,许多“罪名”都是预设的。不顾人家论述的完整性,先给对方戴上“欧洲中心论”高帽,未经严肃论证即一锤定音。读者可试着对阅前几位学者的原著,他们何曾回避过制度、科技与经济需求的对应关系?回头再看弗兰克自己,面对制度、科技与经济在近代社会进程中互动推进、不断创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大量经验事实,他却闪闪躲躲,说明对这种整体主义的互动分析缺乏起码的尊重。主观的执拗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只能循着上面说的“人类社会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推动”的单向路线走去,不期然地踏上了早被学界抛弃的“经济决定论”老路。

弗兰克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关键一章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全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多数从亚当〔QS(1)·〔QS)〕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相当陈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有关资本积累。据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的白银来去的运动过程中两头大捞好处,从而造成了欧洲“劳动分工和利润”的优势,“最终中了头彩”。先不论他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完全看作是贸易的结果,更妙的是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前面几章刚刚大肆渲染过“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议论。试问:居然大量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运回去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生活消费品(丝绸、茶叶、瓷器),而且又坚决否认“中国秘密”一说,中国理应首先得到“资本积累”的好处,在“劳动分工和利润”优势方面领先一步,为什么欧洲却能乘时“兴起”而超越中国?这一悖论本不难回答,但弗氏既然犯有“制度忌讳症”,只好自打耳光。这种“制度忌讳”甚至发展到对任何有关“强调中国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历史陈述都非常反感(见其对黄宗智的批评)。从这点上我就敢肯定,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体验——他的热爱“东方”并非完全出于理智。再有同是欧洲,同样地从亚洲的贸易中捞得好处,为什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能领受工业革命的风骚,却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最终让英国占先得利?上面说的好处在那些国家又是给什么样的“天狗”吃掉了,中不了“头彩”?弗氏无疑读过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生活、经济与资本主义》巨著。针对上面的问题,布氏关于世界经济空间转移的大量陈述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详尽、精彩的解释,为什么视而不见?别无它因,又得回到“制度分析”上来。忌讳制度的作用真的成了弗兰克不敢直面历史的“心理死结”。

二关于人口、劳动成本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据说由于长期的白银资本大量流入,使亚洲

和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而“（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与之相关，欧亚形成了两种经济模式反差：在亚洲是低工资—低成本，在欧洲是高工资—高成本；后者成了技术变革的推动力，亚洲则没有。这一假设涉及的问题太多，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清点。例如上面的概括及其凭借的数据是否真实，在欧亚都大可怀疑。造成技术变革的因素是否如此单一，决定技术变革的要素究竟有多少，他回避了什么，隐匿了什么，也值得追究。前面肯定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高于欧洲，人口—劳动成本的背景未变，如此前恭而后倨，将何以处置等等。我只想反驳一点：弗兰克不是对20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复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那里人口的增长未见缓和，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值，而低工资—低成本的背景也未有大的改观，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又将何以解释？同样的背景，为什么以前拒绝技术变革，而现在却能成功引进和发展本土化的高科技，并无阻碍？可见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是一帖包打天下的灵药。历史的演进决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一因素论就能圆通解释的。

弗兰克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些解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无奈之下，他既然搬出“猫论”试图解脱困境。他在为中文版写作《前言》时突发奇想，原话照录于下：“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要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如果这是用来解释某种短时段的事件，这些议论虽不算高明，但作为谋略贡献给当政者也算是一份菲薄的礼物。然而却要把它作为全书的主题，用以解释至少两个世纪的“衰落”与“兴起”，那我们这些学究真只能无言以对了。我很奇怪，既然事情本如此简单，一切都取决于“谋略”，取决于“一念之差”，弗兰克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厚的书来故意为难读者？

在我看来，妨碍弗兰克事业成功的真正敌人是他自己。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不说远的，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变化之快出乎想象。由此人们不能不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由来，也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和保护这种创造能力，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架比较能促进或适应这种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这样的感觉弗兰克就没有？我表示怀疑。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益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被质疑并激起反感，除了对欧洲经验本身的总结归纳仍存在许多异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很大程度应归咎于某些人的“西方自大”情结。致命的错误发生在把欧洲经验加以普遍化和绝对化，并试图以强力推行这种经验。无端的傲慢和粗暴的干预更

使“欧洲中心论”声名狼藉，甚至败坏了自身本引以骄傲的自由主义真谛：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民族或国家亦然如此。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暂时”的胜利（若从历史哲学看，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误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最完美的，缺少了那种对历史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敏感，也怯于承认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但应该公正地说，这些错误决非是“民族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西方学者发起并形成思潮，就足够说明这一点。

如果弗兰克不是从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去挑战“欧洲中心论”，而改从文化层面甚至哲学人类学的深层次上去“清算”它们，或许他的处境会有利得多。

## The Whole History View and Flank's "New Core Theory"

Wang Jiafa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

**Abstract:** Flank's 《Silver Capital》 intends to repudiate "the theory of Europe core". It tries to expand the course of proof by the whole historical view, but it makes another core theory-"China core theory" or "East core theory". We still find that west language system play a dominated role in the narrating the new core theory. Though it's critique of Europe core view is worthy of sympathy, it doesn't scratch where it itches.

**Key words:** Flank Europe core theory the Whole historical view China (East) core theory

收稿日期: 2002-09-13;

作者简介: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